

# 以“文明发展”解构“增长主义”

鲍宗豪 赵晓红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增长不等于发展”,为了“增长”而“增长”,唯 GDP 总量及其以“高增长”为特征的“增长主义”,其逻辑看似积极合理,但并不能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生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主要矛盾。中国已为“增长主义”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与社会代价。因此,解构“增长主义”,是为了让“增长”回归合理、可持续的生长速度,保证未来中国“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国际社会种种“去增长”思想理论及其运动对“增长主义”的解构是不彻底的。“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的逻辑、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的解构,对于引导中国在可持续的健康增长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增长主义; 超常增长; 去增长; 文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095(2014)04-096-09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4.04.012

经济发展离不开增长,没有增长也没有经济发展。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更不能包容一切、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增长”而“增长”,唯 GDP 总量及其速度的增长,是一种以“高增长”为特征,不计“高增长”给生态与社会带来风险与危害的“增长主义”。前些年在我国不少地区热衷追求的“唯 GDP”,在一些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那里有了新的解读,认为中国今后二三十年,只有“超常增长”<sup>①</sup>才能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回应西方关于“中国经济崩溃论”。“超常增长”观点看似积极合理,对中国未来愿景的描绘也令人鼓舞,但实际上仍是一种以“高增长”为战略目标和方式的“增长主义”,是难以引导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没有“超常增长”道路或实现“超常发展”的提法。习近平同志在 2013 年亚太经合组织上的演讲再次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sup>②</sup>但是,一些经济学研究者虽然也说“超常增长”的概念,主要不是讲增长速度,而是增长的

收稿日期:2013-10-22

作者简介:鲍宗豪,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晓红,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① 超常增长是经济学教授史正富在其著作《超常增长:1979—2049 的中国经济》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史正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创造了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奇迹,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它还将继续实现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史正富认为在未来的三十余年里,可以通过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为常规市场注入超常购买力,以此达到建设并永续运营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目的,进而预期一种回报较好的长期投资。遵循这样的路径,史正富认为到 2049 年,中国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均能成为世界领先国家。
- 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 10 月 7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的题为《深化改革 共创新好亚太》的主旨演讲。

质量和效益,能力和水平。但是,要能使中国经济在今后二十年、三十年周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要超常,又怎能保证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超常增长”?就实质而言,“超常增长”是“增长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解构“增长主义”,是为了让“增长”回归合理、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保证“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此,我们从分析“超常增长”的逻辑依据入手,进而实现解构的目的。认为中国经济未来20~30年能“超常增长”的主要理由如下:

——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定要快。要注意:小平同志是在30多年前讲“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前后30多年中国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今天的综合实力今非昔比,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是“贫穷”,而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如再简单地以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的思想来要求今天中国“加速”,明显脱离了当今中国的国情。

——美国在一二百年里平均保持3%、4%的增长率;东亚四小龙五十到六十年代,增长率都是9%。中国人均GDP现在只有美国的20%,因此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很大。<sup>③</sup>问题在于:美国平均保持3%、4%的增长率,是一种健康增长,健康增长必然是“长寿”的、可持续的;“赶超型”的高速增长,不仅资源、能源、社会和生态难以支撑,而且由于“赶超”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太多,全球日益增多的突发性灾难天气,北京的暴雨和雾霾、上海的死猪和超常高温、厦门的公共汽车焚烧等,都给“赶超”构成挑战。同时,与美国相比,虽然增长空间很大,但不一定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超常”地予以填补,因为美国也在发展。

——超常增长的“一个潜力就是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治理可以形成超常的购买力,不仅从供给力方面,还有需求方面”。<sup>④</sup>实际上,在我国GDP增长的统计中,一个重要缺陷是无法统计无效的GDP,诸如消耗生态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无质量的GDP;现在反过来再治理生态环境,从2013年~2017年我国将再投入近五万亿元治理空气、土壤,<sup>⑤</sup>再治理产生的GDP,是没水分的、有质量的GDP增长吗?这种增长是有“发展”的增长吗?

——按照“收敛假说”,一个经济体的超常增长速度实际上取决于它的人均收入跟前沿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差距越大,赶超的潜力越大。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接近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20世纪50~60年代与美国的差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还有20~25年的较快增长阶段”。<sup>⑥</sup>我们不否认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但是,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这种差距。一是简单地从“人均收入”相当于日本或东亚四小龙20世纪50~60年代与美国的差距,判断高增长的空间,其中忽略了经过50~60年发展之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生态难以承受的增长压力;二是据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的研究,目前中国顶层家庭的收入是底层家庭的20倍,资本市场将穷人口袋里的钱转移到富人的口袋”。<sup>⑦</sup>同时,绝大多数人由于认为社会缺乏安全体系,对未来信心不足,所以,将钱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储蓄,不可能更多地用于消费;没有消费的大幅增长,中国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就很难形成旺盛的内需市场,很难调整经济结构,也就难以保证“高增长”。

——如果没有8%以上的经济增幅,地方财政收入就会受影响,地方政府就无法搞建设,无

③ 张军:《中国继续超常增长的动力何在》,《社会科学报》,2013-06-27(2)。

④ 周振华:《中国继续超常增长的动力何在》,《社会科学报》,2013-06-27(2)。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⑥ 张军:《未来30年,中国式超常增长仍将继续》,《社会观察》,2013年第7期,第91-92页。

⑦ 王小鲁:《收入的真相》一文,《财新新世纪》周刊,2013年09月23日。

法解决民生问题。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总量扩张,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项目为主要特点。据专家测算,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相关系数达到了60%。贵州、甘肃与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率分别达到了53%、44%和35%,居于全国前3位。<sup>⑧</sup>实际上,2013年第二季度经济规模曾下滑到7.6%,也没有引起大规模失业。这就要求我们思考,30多年来一直靠政府驱动经济的模式,是否已到了必须改变的关键时刻?让地方政府逐渐回归自己的职能,做公共财政份内的事,做好公共服务。

分析“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要强调的是:未来中国仍需持续增长,但不要“超常增长”,更不要以“高增长”为特征的“增长主义”;以“高增长”为特征的增长主义将陷入种种难以摆脱的“增长”的困境。

## 二、“增长主义”的“增长”困境

实际上,主张“超常增长”的学者也承认,中国未来的“超常增长”难以摆脱当今中国面临的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的“硬约束”,这种“硬约束”也可以说是“增长主义”的现实困境。不仅如此,“增长主义”一直面临各种理论的质疑、修正和挑战。

### (一) 对罗马俱乐部挑战“增长主义”的新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多年中,各国经济迅速增长,世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普遍陶醉在经济增长的成就之中。但是罗马俱乐部敏锐地觉察到了繁荣背后隐藏着的危机,以意大利工业家奥雷利奥·佩西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在全球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受到质疑和挑战,后来,罗马俱乐部的梅萨罗维克又提出了有机增长概念,来修正完善。

今天再看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的观点,仍有其重要价值:一是对以资本积累引导的无限“增长”和“增长主义”,第一次作了非常彻底的批判。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也印证了“增长极限”观点的特有价值;二是“增长的极限”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增长理论。20世纪70年代,阿德尔曼、巴查和泰勒等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否定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思路。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人发展的情况。<sup>⑨</sup>2006年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理念;<sup>⑩</sup>2011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关注增长质量和平衡增长。与上述增长到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路径不同,以布莱克为代表的学者针对传统发展理论的缺陷,提出用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开展发展研究,<sup>⑪</sup>亨廷顿、伊斯顿和阿尔蒙德,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观;亨廷顿提出“发展”应该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sup>⑫</sup>

近年来,后现代思想家对“经济学就是幸福学”的质疑,实质上也是对种种增长与“增长主义”理论的反思。就增长的理想目标及其价值取向看,为什么常常与现实相悖?如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社会财富不充裕的“短缺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认为快乐和幸福主要依赖物质财富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人们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正在变为现实时,“生存

<sup>⑧</sup> 张学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五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3-6。

<sup>⑨</sup> 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五种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是:一是无工作的增长;二是无声的增长;三是无情的增长;四是无根的增长;五是无未来的增长,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可取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sup>⑩</sup>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sup>⑪</sup> 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sup>⑫</sup> 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性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所需的收入稳定了,要让人更幸福就不太容易了”<sup>⑬</sup>。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伊斯特林教授对1946~1970年间美国资料的跨时分析而得出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又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就是幸福学”的看法。实际上,无论是从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因素,或通过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来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或运用各种手段与方法提高测量幸福感,由于背离了“文明发展”的理念、价值取向和方式,都未能真正诠释影响大多数人幸福感的根本原因。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以“资本”为核心和本质取向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是以掠夺自然与社会资源的“不文明”发展,这种“不文明”的增长速度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大多数人越不幸福。

## (二)“增长主义”的生态极限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多快好省”的“赶超英美”战略,结果成为“令人可笑”的“理想主义”,并以令人痛惜的损失而告终,造成虚假的繁荣、无“发展”的增长,乃至天灾人祸。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和地方政府乐于选择“赶超型战略”,但是生态和社会则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为“高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在融化,而且北极的海冰也在融化。PM2.5的污染已成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个日常问题,水和土壤的污染,更让人们担忧,乃至不知所措。近年来因雾霾、空气污染生病人口比例不断上升,2013年持续大规模的雾霾污染范围涉及17个省市自治区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影响人口约6亿。<sup>⑭</sup>世卫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可致癌。2010年,全球22.3万人因大气污染而致癌。<sup>⑮</sup>据悉,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近些年以来,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大概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sup>⑯</sup>多年来,我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全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质不达标;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sup>⑰</sup>

美国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强调:“近来的迹象表明,如果我们想避免地球灾难,就要将气温增长控制在2℃以内。2℃越来越成为地球临界点的象征。<sup>⑱</sup>因此,我们立即开始以每年24%的速度减少碳排放,这样,30年后可减少一万亿吨的排放,也就可避免全球平均气温增加2℃,可避免“生态悬崖”的出现。

## (三)“增长主义”的社会代价

以“高增长”为特征的“增长主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导致社会生态的失衡、失序,突出表现为“四个高”。

一是“高债务”。2013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呈爆发式增长态势。1~6月全国306个城市土地出让金高达1.13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60%;<sup>⑲</sup>地方政府卖地出现“井喷”。一个无法绕过的原因是,随着经济增速减缓,其财政收入出现下降,如今又开始面对还债压力。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还债高峰来临,卖地收入成为各地政府最现实、最快捷的财源。2012

<sup>⑬</sup> 理查德·莱亚德著:《不幸福的经济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sup>⑭</sup> 《我国将建雾霾健康监测网》,《北京青年报》,2013-10-08。

<sup>⑮</sup> 世卫组织认定大气污染可致癌, <http://news.163.com/13/1018/10/9BFCB89D00014AEE.html>。

<sup>⑯</sup> 中国癌症村地图解密, <http://env.people.com.cn/n/2013/0221/c1010-20556848.html>。

<sup>⑰</sup> 贺军:《农村污染动摇社会根基》,《社会科学报》,2013-07-11(2)。

<sup>⑱</sup>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莱特·克拉克:《星球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5期,第58页。

<sup>⑲</sup> 周俊生:《改革土地财政制度已刻不容缓》,《每日经济新闻》,2013-07-12。

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再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sup>④</sup>

二是“高分化”。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提高,在世界上排在第2位,但近年来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现出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sup>⑤</sup>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但大部分发展成果却为少部分人享有,贫富差距在扩大?实际上,只要把握“分化”是随着“高增长”、快速城市化而出现的一种现象,那就不难理解我们的结论:“高增长”,是造成当今中国城市“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不协调”的“高增长”,使一部分市民百姓被甩出“高增长”的“经济跑道”或者说“经济圈”,被“不和谐”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边缘化”或“贫困化”,而被“边缘化”或“贫困化”的市民百姓,在“高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已无能力、亦无机会再融入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亦难以摆脱“贫困”的命运。

三是“高冲突”。在“高增长”进程中,由于改革前和改革中形成的新旧的矛盾集中爆发,社会生态趋于紧张,加上部分媒体责任缺失,挑弄社会情绪,导致矛盾冲突多发。有的人无视公序良俗,自我利益至上,破坏公共秩序和威胁他人安全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蔓延海外。

四是“高腐败”。主要特点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前腐后继。1997年至2002年,局级干部职务犯罪2422人,省部级是98人,较1992至1996年分别增长44.8%和25.6%。这充分表明“高增长”十年所带来的“高腐败”。相反,2008年以来,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文明发展”道路,腐败率在下降。2008至2012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2003至2007年,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2008至2012年较2003至2007年总的腐败率下降了5.43%。<sup>⑥</sup>

### 三、“去增长”能解构“增长主义”吗

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主义”在受到各种质疑和抵制的同时,又面临生态与社会的困境,如何破解?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可通过技术来平衡化石燃料导致气温上升而对星球构成的危机。但是,研究者认为,光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梦想正在迅速破灭。因为技术方案不仅要受到物理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规律的制约。”<sup>⑦</sup>

那么如何解决“资本”无限增长而将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呢?能否说服“资本积累”,限制“资本”无限制增长?这如同要一个人停止呼吸一样困难。20世纪70年代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以及“零增长”的观点,在当今世界又有了新的发展。如第一届“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去增长国际会议”(Conference on Economic Degrowth for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Equity),于200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2010年,第二届会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并发表了《巴塞罗那去增长宣言》。第三届会议于2012年9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召开,且声势越来越大。前后三届国际会议,基本上反映了近六年来国际社会以“去增长”(或“零增长”)运动破解“增长主义”、保护生态和社会公平的努力。

<sup>④</sup> 国家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公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sup>⑤</sup> 《社科院报告称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影响消费》,《北京晨报》,http://news.163.com/12/1219/02/8J292LAT0001124J.html.

<sup>⑥</sup> 以上数据参见2003,2008,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sup>⑦</sup>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莱特·克拉克,张永红:《星球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5期,第59页。

### (一) “去增长”对“增长主义”的解构

近六年来,“去增长”的主要工作和观点是:

1. 发动大规模的“去增长”思想运动。2009年,马乌罗·博纳尤蒂(Mauro Bonaiuti)以名为“去增长”(degrowth)的一场大规模思想运动为基础,举办“去增长”专题论坛,出版了《“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去增长国际会议”论文集》,尤其是对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去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欧盟国家兴起了对“去增长”理念的宣传和呼吁,剑锋直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破坏了社会和环境的意识形态(增长从本质上来讲是有益的)与社会实践(通过调整价格机制解决问题)。<sup>④</sup>

2. 马乌罗·博纳尤蒂在《去增长:解决多重危机的复杂分析工具》(“Degrowth: Tools for a Complex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by Mauro Bonaiuti)一文中指出,“去增长”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积累、创新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各种社会不稳定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去增长”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也是“现成的政治解决方案”。

3. 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经济学教授塞奇·拉图什在《左翼能摆脱经济主义吗》(“Can the Left Escape Economism”, By Serge Latouche)一文中认为,“去增长”必须改变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主要地位,否则自发增长的技术系统必然会脱离控制,把人类带入绝境。

4. 肯尼亚的社会活动家特里萨·特纳·利·布朗希尔和瓦胡·卡拉(Wahu Kaara)在《去增长?“消除异化”又会如何?》(“Degrowth? How About Some ‘De-alienation’”, by Leigh Brownhill, Terisa E. Turner & Wahu Kaara)一文中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运动是人民在生产、消费、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然界中“消除异化”(即消除“资本异化”)的力量。

5. 美国霍华德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大卫·施瓦茨曼在《对去增长及其政治的批判》(“A Critique of Degrowth and its Politics”, by David Schwartzman)一文中指出:“去增长”的支持者博纳尤蒂和拉图什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对如何取代它却没有明确的见解。施瓦茨曼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案就是生态社会主义。<sup>⑤</sup>

### (二) “去增长”对“增长主义”解构了什么?

“去增长”对“增长主义”解构有三:一是解构的目标明确,针对资本的无限增长需求,剑锋直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二是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各种社会不稳定和冲突,要求民众必须关注“去增长”;“去增长”不仅是口号,也是“政治解决方案”;三是从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到“去增长国际会议”和欧盟国家对“去增长”的宣传及其思想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但是,“去增长”运动对“增长主义”的解构是不彻底的,原因有二:一是西方学者的“去增长”思想理论本身很完整,也较透彻,但是,这些理论包括政策建议大多停留于“思想”或“理论”,并未进入“去资本无限增长”的制度设计或安排;二是生态社会主义、女性生态主义及其种种运动,虽然锋芒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并认为要推翻资本主义,破解“资本无限增长”的难题,实际上也是在目前资本主义能包容的范围内开展对资本增长的机制及其思想运动,也只是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跟头”而已。

<sup>④</sup> 赛德著,王维平、张娜娜编译:《“经济”与“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6期,第96—98页。

<sup>⑤</sup> 赛德著,王维平、张娜娜编译:《“经济”与“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6期,第99—101页。

#### 四、“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的解构

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也离不开“货币资本”的积累,社会主义在引入“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市场机制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以“高增长”为特征的“增长主义”内蕴的资本逻辑,已在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要发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以“文明发展”解构“增长主义”。

##### (一)“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逻辑的解构

如前所述,以高增长为核心的“增长主义”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的“资本无限积累”为基础的。难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认为,至今为止,位于全球主导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沃勒斯坦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也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优势能在改革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他在“南方谈话”中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发表2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在逐步展现。当前,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形成。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然而,社会主义要富裕、要增长、要发展生产力,但并不是富裕了、生产力发展了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差异是将建设公平、公正、文明幸福的社会作为最根本意义上的价值取向,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它们都要建立人人公平、人人幸福的和谐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离开这一基本理念去谈“增长”,去谈富裕,去谈生产力发展,必然会丢弃社会主义的本质,背离社会主义的初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号称要追求建设公平、幸福的社会,但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将之付诸实践,能够通过制度安排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文明发展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文明发展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昭示着中国政府对未来发展的宏观思索和实践把握,它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更是一种制度安排,还是一种发展路径的选择。文明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包容性的发展,它所指向的是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是一种系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生产发展是基础,生活富裕是目的,生态协调是保障,三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事实上,也唯有走生产协调、生活富裕、生态平衡的文明发展道路,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公正、和谐、幸福、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说“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文明发展”则回答了如何可持续增长,可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发展”不仅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夯实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且回应了“增长方式”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断言,解构了增长主义唯“资本”为大,唯“资本”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基础。

## (二) “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中“见物不见人”价值取向的解构

唯 GDP 的增长主义,其价值取向是“货币资本”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即“见物不见人”的增长,结果导致增长质量、增长效益的缺失,导致发展中价值理性的缺场和失语,由此产生了种种增长悖论,增长困境。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sup>②6</sup>

“文明发展”不仅要做到生产、生活、生态三个方面的协调,而且始终要明确“为谁发展”?“为何发展”?将“以人为本”作为“文明发展”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要求引导和规范“资本增长”,保障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sup>②7</sup>孙中山先生强调的“发展文明”应为人民谋幸福,不仅将是否“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发展文明与不文明的标准,而且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与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文明发展一脉相承,所指向的正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文明发展”,以“人的幸福”为本的“文明发展”。这就使得发展实现了为了人、朝向人的合理回归,解构了“增长主义”中盛行的“见物不见人”的不合理价值取向。

## (三) “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评价尺度的解构

唯 GDP 论是增长主义的主要特征,习近平同志强调,今后不以 GDP 论英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评价“增长”和“发展”的绩效?文明发展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经济增长、否定 GDP 的基础性作用,而是要打破 GDP 迷信,不再将 GDP 作为唯一的、独断的评价尺度。

文明发展的评价尺度是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有机统一,贯穿于文明发展的目的、过程和结果之中。它与不文明、不科学、不持续、不公平、非理性、野蛮发展(包含一部分人依靠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发展)相对立。只有当“以人为本”的“文明发展”,在发展目的、发展过程、发展结果中都能得到充分体现,才可以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文明的,才能真正为该地区、该国家人民的幸福奠定基石。因此“文明发展”作为一种评价尺度,它强调发展目的、发展过程、发展结果“三位一体”的文明,它是对“增长主义”以经济上的“高增长”为最高目的和评价尺度的解构。

一是发展目的的文明。以全体人民和整个人类的福祉为本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所以强调发展目的的文明就是必须以全体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为最终追求,而不是以牺牲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而获得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目的。

二是发展过程的文明。发展过程的文明,不仅仅是发展起点的文明,也不是发展的某一阶段、某一部分或方面的文明,它突出的是发展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文明。

三是发展结果的文明。发展结果的文明主要体现在发展成果如何分享。发展成果不仅要在当代人之间进行分配,同时要在继承前人财富的基础上,在当代与后代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与享用。如果由于部分人的发展造成了另一部分人发展权益的丧失和发展阻碍,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轻视增长质量和效益,无视生态环境,采取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必然导致不文明发展,必然扭曲发展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产生发展不文明不幸福的感受与评价。

当然,文明发展作为一种评价尺度,自然不能停留于对“增长主义”的理论解构,而且要努力通过构建“幸福指数”、“文明发展指数”等新型评价体系,综合主客观双方面的因素,“集约式”地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集约式”地

<sup>②6</sup> 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sup>②7</sup> 《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页。



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绩效。

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不丹国王率先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在巴黎发布“幸福指数”的测试系统,该幸福指数涉及的 11 个因素依次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2012 年,联合国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政府提出了幸福指数、文明指数、文明进步指数等评价指标并付诸实践,国家统计局等政府部门也正在致力于在前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推出更加科学、完备的幸福指数、和谐指数、文明发展指数等,这也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探索。

##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Deconstruction of Growth Mania

*BAO Zong-hao, ZHAO Xiao-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Growth is not equal to development. The growth mania focuses on the total GDP and the high growth, the logic of which appears to be positive and rational, but in fact, cannot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 China is faced with, such as unbalanced growth, 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 has paid a heavy social and ecological cost for the growth mania. Therefore, the deconstruction of growth mania is to let the growth return to a rational and sustainable rate,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benefit of future growth in China. The “un-growth” theory and its mo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re not complete for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growth mania. Th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It can deconstruct the logic,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growth mania. It can lead China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national revival in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growth mania; extraordinary growth; un-growth;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